

沖繩縣公文書館藏 葛超智 (George H. Kerr) 臺灣相關資料 與其生平*

蘇瑤崇**

摘要

葛超智 (George H. Kerr, 1911-1992) 為美國前駐臺副領事，影響臺灣獨立運動相當深遠。他身後留下大量有關戰後臺灣的史料，主要收藏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日本琉球大學、沖繩縣公文書館，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文獻中心，這些都是探討臺灣戰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公文書館所藏，國人所知不多，藉由資料中心呈現的葛超智生平及與臺灣戰後的關係，並介紹資料內容重點，是本文主要目的。

第一部分以公文書館所藏為中心，比較與其他地方收藏之不同，以呈現其特色。第二部分以葛超智生涯為中心介紹整體資料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1941年臺灣任教以前之葛超智生平概略；二，自1942年至1947年止任軍職與公職期間，其個人事蹟與當時臺灣歷史之關係；三，離開公職後其學衛生涯及晚年生活，包括其著作與出版時代的問題，與著作的影響。

最後結論，就其影響而言，他的著作《被出賣的臺灣》，不只是學術撰述，更是當事者的紀錄，具有第一手史料價值，並帶給讀者二二八事件事實的震撼。至於其所藏有關臺灣的資料，包括書籍與紙本文件史料等，數量相當龐大，然而，對這些資料的探討仍相當少，相信如果能深入這些資料，加以研究，將可揭發出一些仍被埋沒的歷史事實，對於後人認識臺灣戰後史，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葛超智、費正清、《被出賣的臺灣》、二二八事件、託管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RRA)、臺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琉球史、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USCAR)、臺灣獨立運動

* 本文感謝審查委員的審查與指導。本文的完成，感謝日本交流協會提供招聘學者研究獎助，沖繩大學又吉盛清教授與沖繩縣公文書館館員的諸多協助，以及美國東北大學教授 Jonathan Benda 給予意見與英文校正。最後，並以此文紀念葛超智先生百年冥誕。

**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來稿日期：2011年4月26日；通過刊登：2011年7月3日。

- 一、前言
 - 二、公文書館藏葛超智資料概況
 - 三、家族關係與 1940 年任教臺灣以前的經歷
 - 四、任軍職與文職的公職期間（1942-1947）
 - 五、有關琉球與臺灣研究的學術生涯與晚年（1947-1991）
 - 六、結論
-

一、前言

葛超智（George H. Kerr 1911-1992），為美國前駐臺副領事，曾參與美國占領臺灣計畫的設計與訓練事務。任副領事期間，因同情臺灣人受腐敗中國政府壓迫，於二二八事件後，拯救臺灣人菁英，鼓吹臺灣託管論，並出版第一本記錄二二八事件的著作 *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臺灣》），對臺灣獨立運動的影響相當深遠。他身後留下大量、特別是有關戰後臺灣與琉球的史料。有關臺灣部分，主要收藏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日本的琉球大學、沖繩縣公文書館（以下簡稱「公文書館」），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文獻中心，也有部分重要收藏，這些都是探討臺灣及琉球戰時與戰後史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為何沖繩縣也保有眾多的葛超智資料呢？這與他戰後投入琉球歷史研究有密切關係。1996 年，葛超智的法定代理人克里斯·皮爾司（Chris Pearce）先生，將其留下的最後相關資料，捐贈給沖繩縣新成立的公文書館，共 31 箱，總數達 1,851 件，可知數量之豐富。¹

關於葛超智收藏資料的相關研究，除筆者整理出版其資料集之外，² 只有學

¹ 參考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沖繩県公文書館研究紀要》3（2001 年 3 月），頁 107-130。相關資料收藏目錄，已由沖繩県公文書館編輯出版。參見沖繩県公文書館，《ジョージ・H・カー文書目録》（沖繩：該館，2011）。

²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委託筆者編輯、整理相關資料，前後出版的史料集有：《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

者珍京斯 (A. P. Jenkins) 曾針對公文書館所藏葛超智資料撰文介紹,³ 餘並未見。珍京斯的文章, 主要係針對公文書館所藏部分, 說明其內容大要、資料整理過程與相關問題等, 這是了解公文書館葛超智資料的重要參考文章。不過, 該文並未言及其他地方相關收藏情形。

公文書館所藏葛超智資料的特色為何, 必須與他處的收藏相對照, 才能顯示其獨特性與重要性。筆者有幸曾至前述其他資料館中, 進行葛超智資料的調查, 得以比較其間情形。就其特殊性而言, 除與琉球歷史與文化有關外, 更重要的是眾多有關葛超智個人關連的直接資料。由於葛超智不只捲入二二八事件, 他的託管思想及其著作對日後臺灣獨立運動也有重要影響, 這使他成為臺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個人生平也反映了二次大戰至戰後臺灣的一些問題, 具有研究上重要的意義, 值得探討。然而對於此, 雖已有許多先行研究,⁴ 但因多未以個人直接

(上)、(下)》(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0);《葛超智先生文集》(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0);《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6)。筆者整理資料之心得, 可參見〈葛超智先生文集與書信集評論〉,《臺灣人文生態研究》4:2 (2002年7月), 頁57-70;〈葛超智資料整理過程說明〉, 收於蘇瑤崇主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 頁612-615。同註1。

³ 老一輩臺灣人的回憶錄, 最初出現葛超智身影的有: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臺北:獨家出版社, 1991);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等。最早的學術研究有:鮑紹霖,《「臺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臺北:海峽評論出版社, 1993);陳翠蓮,〈第六章:外國勢力與二二八事件〉,《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 收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臺灣人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臺北:前衛出版社, 1994), 頁69-110。另外, 還有本文註2所列, 筆者整理出版的相關資料集。之後則有:黃富三,〈葛超智與臺灣主體意識的發展〉, 收於胡健國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 2002), 頁1114-1119;蘇瑤崇,〈葛超智先生 (George H. Kerr) 託管臺灣論之思想與影響〉, 收於國立嘉義大學編,《歷史、地理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嘉義大學, 2004), 頁533-573;蘇瑤崇,〈葛超智 (George H. Kerr)、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之關係〉,《國史館學術集刊》4 (2004年9月), 頁135-188;蘇瑤崇,〈脫殖民地乎:UNRRA 資料所見的臺灣戰後善後重建問題〉, 收於蘇瑤崇主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 頁9-33;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卷四之論文論述。另外, 畢凌晨 (Abram Sitzer) 探討美國外交部門對臺認識的歧異 (參見畢凌晨,〈葛超智對二二八事件與美國政府觀點之差異:第一手觀察與外交決策間的矛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美國東北大學教授 Jonathan Benda 則從修辭學角度探討 *Formosa Betrayed* 的影響 (參見“The Rhetorical Reception of George H. Kerr’s *Formosa Betrayed*,” at a research network forum at the 2010 Rhetoric Society of America conference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USA); Jenkins 先生整理沖繩縣公文書館葛超智資料的發表, 參見 A. P. Jenkins, “G. H. Kerr’s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and Beyond,” *The Ryukyuanist* 52 (Summer 2001), pp. 3-8; 以及蕭成美、川平朝清,〈カール先生について〉, 收於ジョージ・H・カー著、蕭成美譯,《裏切られた台湾》(東京:同時代社, 2006), 頁1-15等等。

史料研究之故，有些部分仍存在著猜測。公文書館所藏葛超智資料，正可補充過去不足之處。

因為國人對公文書館所藏仍然相當陌生，是以一方面對照各地收藏情形，以呈現公文書館典藏特色，另一方面則以葛超智生平事蹟為主幹，以介紹這些資料的內容重點。希望透過本文的介紹，國人得以從不同資料理解更廣泛的臺灣戰後史相關問題。

二、公文書館藏葛超智資料概況

公文書館位在沖繩縣南風原町新川，離那霸市區不遠，有多線公車到達，也提供影印協助，是研究相當便利的地方。然而有關葛超智資料，卻有令外國人感到不便與不解的規定。因為它屬於個人文書類，基於日本「個人情報」保護原則，在申請閱覽文書時，資料內容仍須再接受檢查，以決定開放閱覽與否。如果檢查專員認為其中包含第三者個人資料，甚至會決定不開放閱覽。在這情況下，往往必須耗費時間等待審查結果，而且也常碰到網頁上列為「公開」的資料，但審查後卻又不公開而無法閱覽的情形。

公文書館藏葛超智資料目錄的分類，基本上分三階層。第一階層分五大系列群，包括：一，有關日本與琉球出版品與相關資料（Publications on Japan and Okinawa and Related Projects）；二，有關臺灣出版品與相關計畫資料（Publications on Taiwan and Related Projects）；三，有關夏威夷著述的相關資料（Writings on Hawaii with Related Papers）；四，其他相關的學術出版或計畫（Other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Projects）；五，個人文件（Personal Papers）。在這五大系列群下，分別再有第二層的分類項，然後在分類項下，才是第三階層的各文件編號。調閱的時候，是就第三階層的資料碼申請閱覽。

雖然一個資料碼算「一件」，但卻不見得每個資料碼就是單一一件（item），也常有一個資料碼含多件（items）資料，內容也不完全與目錄的標題一致。例如第 1 項日本與琉球的資料，也可能出現在第 4 項其他的學術出版中。⁵ 故不能單以目錄

⁵ 在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文中指出，葛超

標題作為資料搜尋的對象，在時間許可的範圍內，應盡可能逐件瀏覽搜尋，說不定會有意外的發現。目錄中亦建置有資料解說，點進資料碼，即出現該筆資料，包括解說等相關的登錄內容。解說內容雖然簡單，卻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參考。

上述公文書館的分類方式，是根據裝箱送來葛超智資料內容的大抵狀況，所作的五大分類。⁶ 對照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購入葛超智資料時的原始分類，可約略發現兩者內容的不同。二二八紀念館資料的原始分類，為書籍雜誌宣傳冊子 (Pamphlets) 類、新聞與剪報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以下簡稱 UNRRA) 相關資料與書信類、美軍攻臺計畫相關資料，以及其他手稿書信備忘錄等五項。⁷

這些分類方式，正好呈現葛超智資料的內容重點。除了書籍、雜誌之外，如果將收藏於臺灣、美國與日本三地這些葛超智紙本資料合併計算，初略估計總數量至少有數萬張以上。⁸ 若借用前述內容分類基準以呈現各地資料館收藏特色，可以歸納成表一，可說反映了原始葛超智資料內容的整體樣貌。

表一 各地資料館收藏葛超智資料之特色

分類內容 收藏地點	臺灣相關之新聞 剪報類 ⁹	UNRRA 相關 資料與書信類	美軍攻臺計 畫相關資料	臺灣相關之 手稿備忘錄	與臺灣人有 關之書信	有關琉球之 資料、手稿 與書信	個人生平、 夏威夷研究 等資料
臺北二二八 紀念館	約從 1940 年至 1970 年	幾乎全部	絕大部分	1950 年代以 前臺灣為主	1970 年以前 為主	甚少	幾件
沖繩縣公文 書館	與他個人有關之 新聞剪報為主 (含日文剪報)	幾無	些許	1960 年代之 後美中臺關 係為主	1970 年代以 後為主	大部分	全部
琉球大學	約 1960 年代至 1985 年	幾無	一件	些許	些許	大部分	幾無
史丹佛大學	些許	幾無	少部分	少部分	少部分	幾無	幾無

智原始資料收納方式相當混亂，例如在有關夏威夷資料中，也會夾雜有關臺灣的資料 (頁 121)。不過，根據出版的目錄，葛超智資料收納混亂的問題，似乎在整理、編輯過後已大致獲得解決。

⁶ 參見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錄作成に関する問題〉，頁 122。

⁷ 參見二二八紀念館館藏，編號 A-GK-004-0003-009 至 0017。

⁸ 若以原始裝箱方式計算，其中公文書館有 31 箱，二二八紀念館約 20 箱，琉球大學 3 箱，史丹佛大學有資料盒 7 盒。

⁹ 新聞剪報類包含中文、英文與日文，但除了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收藏一些二二八事件時期的中文剪報，其餘絕大部分以英文為主。

從表中可看出公文書館葛超智資料最重要的特色，即在於書信、手稿備忘錄，以及個人生平資料等。若單就與臺灣有關者，手稿備忘錄的內容，主要是出版著作的底稿，以及冷戰時期對美中臺三角關係的看法。書信的內容，主要是與海外臺灣人往來的紀錄，包含他和彭明敏的關係、¹⁰ 臺灣著作出版的往來書信，以及與蕭成美來往的書信等。¹¹ 個人資料，則包括從出生到死亡的各项資料、證件與遺囑等。

這些資料不只呈現葛超智個人生平，也與他涉及的臺灣歷史有關。過去國人對葛超智的研究，因未利用這些史料，以至於有些論述只停留在沒有事實根據的猜測。因此，底下進一步就其個人相關資料，論述其生平以及所反映的臺灣歷史。

三、家族關係與 1940 年任教臺灣以前的經歷

關於葛超智的家族，學者尹章義曾經誤將英商寶順洋行（Dodd & Co.）行東顧爾（Crawford D. Kerr）當作葛超智的父親，並說其父親清未曾來臺經商，但這是子虛烏有的猜測。¹² 事實上，葛超智曾因研究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庶民陶器，發現家傳陶器與此有關（此陶器作者正是他的外高祖父），因此展開收集先人資料以進行尋根的研究。他收集的家族資料，主要在第四系列群「其他相關的學術出版或計畫（Other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Projects）」的「葛氏祖先世系研究資料（Genealogical Research Papers: Kerr's ancestors）」資料分類項中。大體而言，內容包括了葛（Kerr）姓之由來、族譜與氏系表、家族信件、先人照片，以及先人所製作陶器的幻燈片等等，其大要如下。

¹⁰ 彭明敏至美國後，經人介紹，委請葛超智協助撰述其《自由的滋味》一書，但兩人卻因此交惡。公文書館中保留兩人來往的書信。不過，彭明敏書信則因個人情報保護法不予公開。兩者的衝突，僅能從葛超智的書信中，片面推測。

¹¹ 與蕭成美的往來書信，以及前述彭明敏書信，構成公文書館的葛超智書信中，相當重要的部分。與蕭書信內容最重要的部分，則是葛超智有關臺灣的資料（即現收藏於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資料），兩人間買賣往來的書信。大抵上是葛超智因大姊住院，急需用錢，於是蕭成美以購買該批資料方式作為協助。然而，日後卻因保存利用等其他問題，而有購回或介紹他處圖書館購買之議。其中，蕭成美書信也是不公開。彭明敏與蕭成美書信因不公開，且其問題屬私人性質，本文僅以註釋簡單說明內容大要。

¹² 尹章義，〈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歷史月刊》219（2006年4月），頁51。

葛超智的外高祖父名為喬治·費雪雷 (George Fishley, 1771-1865)，是英國陶藝家，與著名的約書亞·威治伍德 (Josiah Wedgwood, 1730-1795) 以華麗裝飾風格取勝不同，他的風格是質素簡樸。此一風格透過巴納德·李奇 (Bernard Howell Leach, 1887-1979) 介紹到日本，影響日後日本庶民陶藝運動 (folk art movement) 的發展，著名陶藝家包括河井寬次郎 (1890-1966)、濱田庄司 (1894-1978) 等，都受到其風格的影響。¹³ 喬治的女兒 (Fanny Fishley) 與鐵匠 (James Eddy) 結婚，在 1834 年 7 月 25 日生下孫女 (Fanny Fishley Eddy)。1863 年 4 月 6 日，喬治的孫女與葛超智的祖父威廉 (William Kerr, 1837-1907) 結婚，並於 1869 年 11 月移民美國，前後共有子女六人。他們的長子即葛超智的父親湯馬士 (Thomas Kerr, 1868-1934)，1868 年 6 月出生於英格蘭，畢業於奧本神學院 (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有兩次婚姻，第二任妻子沙拉 (Sara Cunningham) 為他生下一男一女，男孩即為葛超智。

關於葛超智 1940 年到臺灣任教以前的經歷，可從包括他各類證書、報導，以及履歷與自傳等個人資料得知。這類資料主要收錄於第五系列群個人文件 (Personal Papers) 中，特別是 5C 與 5D 的分類，履歷與自傳則分散在其他系列中。在其生平中，常因申請研究計畫或出版書籍等情況被要求附上履歷與自傳，故資料中亦可看到許多不同版本的履歷或自傳。這些內容基本上大同小異，但因提出的對象與時間不同，詳略或敘述的重點也會有所不同。這些資料不但有助於了解葛超智的生平，對於他所涉及的歷史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他出生於 1911 年 11 月 7 日美國賓州派克斯堡 (Parkesburg)，一個人口三千至四千人小鎮中的長老教會牧師館，家中還有一位姐姐。高中時代，總是名列前茅。畢業後，在 1929 至 1931 年間，就讀維吉尼亞州雷吉蒙大學 (University of Richmond) 哲學系，主修邏輯。這時因修課關係，認識一位姓李 (Lee) 的華裔學生，從而開始對東洋的事物感到興趣。之後，轉到佛羅里達州羅倫斯大學 (Rollins College)，1932 年獲得學位。羅倫斯大學當時的校地，即為現在的迪士尼樂園。他的友人多數前往歐洲繼續深造，他卻因父母亡故與經濟大恐慌的打擊，只好到佛羅里達，過了兩年自修東洋知識的生活。

¹³ 參考沖繩縣公文書館館藏，「ジョージ・H・カー (George H. Kerr) 文書」，編號 GHK4D01013。

之後，他拿到燕京大學獎學金，原計劃前往北京留學，但中途為了到夏威夷看活火山，於是買了經夏威夷、橫濱的船票。在往夏威夷的船上，認識了許多夏威夷大學的年輕教師，並受到他們的影響，於是到了檀香山後，他決定先修完碩士課程後再去留學，其間主要選修太平洋史與亞洲史相關課程。夏威夷大學期間，他認識了一些來自沖繩的學生，這是他與琉球最初的接觸。另外，也修讀了蠟山政道先生的課程，開啟他與日本的接觸。

1935年，拿到夏威夷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後，便計畫到中國留學之前，先在日本待一個暑假。這期間受到蠟山政道先生的招待，認識很多日本學人，後來更在蠟山政道先生的建議下，延長停留時間。就這樣子，為了透過藝術更深入了解日本的社會、文化，又延長了兩年，最後則放棄到北京留學的計畫。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獲得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的獎助；¹⁴ 同時，也在早稻田大學第二學院兼教授英文課程。在日本期間，他寫下第一本書 *Contemporary Japan*（當代日本），這是有關日本美術的書籍。該書原計畫於1942年2月由東京的北西堂（Hokuseido）出版，並已完成排版和印製，卻毀於1944年的空襲戰火中。¹⁵

之後，友人因生病而無法履行在臺北的英文教師合約，必須回美國，所以託他代為繼續未完的合約。1937年8月之後，他來到臺灣教書，先後任教於臺北高商、臺北高等學校。原先他只想停留半年，但契約完了時，又一再續約，一直到1941年3月底為止。¹⁶ 他自述當日本發動對中國戰爭後，對外國人而言，在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生活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困難，這是他離臺的主要原因，¹⁷ 結果他在臺灣共待了三年半多。在這些過程中，他認識了非常多琉球人，種下了日後與琉球的因緣。離臺回美後，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班，不久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¹⁸

¹⁴ 《朝日新聞》，1936年1月20日，第2版之報導。

¹⁵ GHK2D05009-GHK2A06002。另外，在GHK2D05009中，也提到1937年他寫的 *The Lineage of Japanese Buddhist Sects*（日本佛教宗派的世系）出版，日後又有再版。由此可知，他在日本期間，最主要興趣還是在於文化方面。

¹⁶ 在臺任教相關契約書，可以參考GHK5D01001-01013等。另外，GHK5I與5J資料非分類項中，有許多在臺任教時學生的照片或紀錄等。

¹⁷ GHK4C01023。

¹⁸ 葛超智經歷，參自GHK2A06002、GHK2A06009、GHK2D05007、GHK4C01003、GHK4C01024-01026、GHK4C01029等自傳資料，以及琉球大學藏「1984年2月20日葛超智致琉球大學圖書館事務長平良惠」與「1985年3月10日致館長瀨名波之信」。

四、任軍職與文職的公職期間 (1942-1947)

葛超智與臺灣歷史最有關連的時期，是擔任美國公職這段時間。關於這部分的一手資料，主要收錄於第五系列群個人文件 (Personal Papers) 下的個人受雇資料 (Employment Records) 分類項，即登錄號 GHK5D 下的資料。這些資料以個人證件為主，也有他個人的自傳與履歷資料等；對這段時期發生的種種，有補充性說明。

這些資料可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戰時擔任軍職的經歷，其次是戰後自軍職轉任副領事文職時發生的種種。關於他軍職期間的具體作為，筆者想另文討論，以下僅就其事蹟簡單說明。關於後者副領事期間，已有許多先行研究。¹⁹ 不過，沖繩公文書館所藏資料，仍有許多過去研究從未利用的資料，其內容對於探討臺灣戰後情形、二二八事件乃至美國託管計畫等歷史問題與爭議，具有佐證的重要意義。以下根據這些資料，作補充性說明。

他加入軍職係出於毛遂自薦。珍珠港事變後，他認為日本終將失敗，臺灣也將捲入戰場，因為他是極少數曾長期待過臺灣的美國人，考量自身經驗或許對美軍有所助益，遂於 1942 年 1 月分別寫信給陸軍、海軍與國務院自我推薦。不過，最初海軍與國務院並不感興趣，只有陸軍邀聘他，在華盛頓五角大廈軍事情報部的日滿支局 (the Japan-Manchuria Branch of Division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任陸軍文職「臺灣專家」(Formosa Specialist) 的工作，從事有關各種臺灣軍事情報分析、戰略與軍事計畫策定等，時間約自 1942 年初至 1943 年底。²⁰

1943 年底，由於尼米茲將軍計劃進攻臺灣，需要有人協助，於是海軍上尉洛克斐勒三世 (J. D. Rockefeller III, 1906-1978) 來找葛超智，要求他自陸軍文職轉任海軍軍職，遂於 12 月 30 日起轉任海軍，官拜預備役上尉 (Lieutenant, USNR, 1944-1945)。²¹ 這時候他被派到海軍軍政學校 (the U.S.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工作，在傑賽普 (Dr. Philip Jessup, 1906-1977) 的協助下，成立臺灣研究小組 (Formosa Research Unit)，訓練將來占領臺灣時的

¹⁹ 同註 4。

²⁰ 參考 GHK2A06009、GHK4B01039、GHK4C01006、GHK4C01024、GHK5D01013。

²¹ GHK2A06009。

軍政治理人員，以及編寫臺灣相關的民政手冊。²² 1944年10月以後，尼米茲將軍放棄攻占臺灣計畫，臺灣小組解散，他轉任華盛頓海軍情報處（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臺灣組（Formosa Desk），並擔任普林斯頓及哥倫比亞大學內海軍軍政學校（Naval School For Military Government）的講師與研究員。²³ 戰後不久，身為海軍附屬武官（Assistant Naval Attaché）的他被派往駐重慶大使館；同年10月24日，則以海軍代表身分，隨美軍福爾摩沙聯絡小組（Formosa Liaison Group），再派往臺灣，見證中國政府的接收。

美軍聯絡小組，不只要見證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也包含代表盟軍執行相關戰後處理的問題。當時團長是陸軍上校葛利德雷（Colonel Gridley），葛超智是海軍唯一的代表。代表團原本有義務向大使館報告臺灣的情形，但卻發生美軍上校艾文思掠奪總督府黃金近80公斤的事件。²⁴ 另外，中國政府接收之後，對臺經濟的掠奪也隨即展開。對這些發生的種種問題，代表團團長葛利德雷卻禁止葛超智向大使館報告相關事情。不得已之下，葛超智以私人信函向重慶大使館友人透露相關事情，同時強烈建議美國應在臺設立代表處。²⁵ 是以不久之後，大使館派遣外交官貝博·喬漢森（Beppo R. Johanson, 1909-1946）到臺灣調查相關事情。²⁶ 為此，葛超智甚至遭到代表團的排擠，並遭長官公署向一位美軍海軍上將構陷他在「保護日本人的利益」，致使他在1945年底被召回重慶大使館。然而，在他力辯說明並回復清白後，隨即又被派回臺灣。²⁷

到了1946年初，國務院有意在臺灣設置代表處，他即被調任新職，協助新領事館事務。當時，他奉命在2月7日前先回重慶大使館報告，再回國務院辦理相關事務。然而，1月28日搭飛機離臺欲前往重慶時，卻因天候不佳，飛機迷航，最後迫降在蘭嶼附近。²⁸ 全員被救起後，他是唯一能與蘭嶼雅美族人溝通的人，

²² GHK2A06009、GHK2D05007。

²³ GHK4C01006、GHK4C01026。

²⁴ 詳細情形，請參見蘇瑤崇主編，《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5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46-57。

²⁵ GHK2A06009。相關資料收錄在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上）》，序號8「Kerr to Melville」，頁15-16。該件是草稿，日期記為1945年1月5日，但應為1946之誤。

²⁶ 有關設立代表處之信件，收錄在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上）》，序號14-22，頁30-43。

²⁷ GHK2A06009。

²⁸ GHK5D01013。

這事也被 2 月 5 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報導。²⁹ 最後，他們轉往菲律賓，然後他才回華盛頓。3 月 30 日他正式從海軍軍職退役，³⁰ 4 月 23 日離開華盛頓，5 月 18 日重新回到臺灣，³¹ 6 月 12 日報到，就任副領事新職。³²

公文書館中，收錄幾件他在公職期間的報告，其中特別以 GHK5D01020 這件最為重要。根據館藏解說，它包括 42 項資料，內容涵蓋他從附屬武官到副領事期間的報告與書信或文稿。筆者粗略比對，除幾件外，大部分不見於他處收藏，也不見於美國機密檔案。這些資料，對於進一步了解戰後臺灣的情形非常有幫助，篇幅所限，僅舉一例說明。

葛超智公職期間，與臺灣最密切的關聯即是二二八事件，在前述先行研究中已有很多討論，不再重複。但公文書館資料中，有關他辭副領事職務的原因，則是過去所不知的事實。

任副領事期間，當他要向大使館報告臺灣實況時，卻處處遭到領事的掣肘。³³ 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後不久，他即被大使館召喚，於 3 月 17 日離開臺灣至南京報告事件詳情。他發現原本提給大使的報告，因為要轉給蔣介石理解二二八事件之故，文句遭到修改，語氣更為緩和 (palatable)。³⁴ 而更令他感到不滿與憤怒的是，3 月初臺灣人意見領袖透過他提出的託管請願書，原本是列為機密報告，但在大使館中卻是解密的狀態。他深深懷疑它也已經被蔣介石的人看過，因為鎮壓過程中所殺的臺人菁英，正好與請願書的連署人士相同。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已無能為力，也不再適合公職，是以 1947 年 4 月 4 日分別向國務院與大使館辭去副領事職務。³⁵ 大使館曾想繼續慰留他，不過召喚他回南京的

²⁹ GHK4A01022-01026。另外，GHK4A01031 是他撰述有關飛機迫降事情的經過。

³⁰ GHK5D01013。

³¹ GHK5D01024。

³² GHK5A01001。他的副領事辭令自 4 月 17 日生效 (GHK5D01013)。

³³ GHK2A06009。

³⁴ GHK4C01029。他的原始報告，收藏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館藏編號 GK-004-0002-025，但不見於機密檔案中；而修改後的報告，收在美國機密檔案 China: Interior Affairs, 893.00/4-2147，同時有英文版與中文版，它們都分別提交國務院與轉交蔣介石認知。後來，其內容也被列在對華政策白皮書中。如果比較這兩者的差異，除語氣緩和外，建議陳儀的不適任與美國介入的責任，這兩大點是修改後的報告所無。然而，3 月 14 日他提出的一連串報告 (參見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ior Affairs, 檔號：894A.00/3-1447 CS/A. No.563 之 No.45)，早已有這兩大建議。

³⁵ GHK4C01023。在 GHK5D01021 的資料中，記載他提出辭呈的時間是 1946 年 4 月 4 日。

指令發出時，他乘坐的飛機已在前往國務院的路上。³⁶ 5月26日，當他到國務院報告二二八事件時，主管遠東事務部門的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當面告訴他，華盛頓當局不會有人對臺灣問題有興趣，³⁷ 更令他相信離開公職才是正確的選擇。但他一直到將近8月底，才正式完成了辭職手續。³⁸

除前述理由外，何以他如此堅決非辭副領事不可呢？推測應與臺灣當局要暗殺他的傳聞有關。他的友人中，廣泛流傳著此一暗殺的傳聞，³⁹ 而這件事則在公文書館的資料中得到證實。

在前述 GHK5D01020 的資料中，有一件標題為「給大使的備忘錄：臺灣情勢（Memorandum For Ambassador: The Taiwan Situation）」的文件，提出地點為南京大使館，時間為1947年4月3日，內容主要在報告3月17日至4月2日臺灣情況的發展。這件資料並無美國官式的公文登錄號，筆者在美國機密檔案，無論在中國部分或臺灣（Formosa）部分，都未見到相同或類似的報告，是以這份報告是否曾正式提出，還是只停留在大使館中未被歸檔，仍待推敲。這份報告的第三頁有一段「（當局）對外國人態度（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指出：

事件後，陳儀當局對於外國觀察家非常敏感……照此下去，可能發展成排外運動……未經證實消息指出，副領事的生命有危險，……一位 CNRRA 官員向 UNRRA 官員透露（intimated），⁴⁰ 不只是副領事有危險，也包括領事（步雷克，Ralph J. Blake），UNRRA 報告官（彭德華，Edward E. Paine）以及 Jardine Matheson Company 的經理等，都必須「小心」（take care）。⁴¹
（底線為筆者所加）

³⁶ GHK4C01012。

³⁷ GHK4C01015、GHK4C01023。

³⁸ GHK4C01012。

³⁹ 包括其友人王育霖、金關丈夫及前述蕭成美、川平朝清兩人合撰之〈カール先生について〉等，均曾提到此事。筆者在1999年規劃「被出賣的臺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時，訪問一位曾任葛超智秘書的臺灣人老先生，他也提到二二八事件時期，葛超智曾面臨暗殺的危機。

⁴⁰ CNRRA（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簡稱；UNRRA 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簡稱。其在臺活動情形，可參考蘇瑤崇，〈脫殖民地乎：UNRRA 資料所見的臺灣戰後善後重建問題〉，頁9-33。

⁴¹ GHK5D01020。

當時依賴美援甚深的國民黨政府，諒應不致於膽敢犯下暗殺外國外交官之忌，以招致外國干涉吧。但葛超智的人身安全遭到恐嚇與威脅，卻是事實，這應該是促使他堅決辭職的理由之一。

而他懷疑蔣介石知道託管請願聯署書一事，也寫在 *Formosa Betrayed* 書中，然而此事卻無法在中文資料找到相關佐證。目前已公開的中文史料，包括《大溪檔案》、⁴² 國史館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以及其他已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等記載，都看不到蔣介石的鎮壓與託管請願書有所關聯，蔣介石對此事有多少認知或重視仍是個疑問。現有資料中，可看到的是鎮壓是以「肅清共匪」名義為之，但背後隱藏的卻是藉機整肅與報復。目前公開的美國機密檔案亦看不到當時連署的文件。從這些情況推論，筆者認為當時鎮壓殺害的臺籍菁英與託管連署書有所重疊，應該是歷史的偶然；葛超智認為大使館曾流出聯署名單之說，並無直接證據可資證明。

最後，發生在 1948-1949 年有關美國託管臺灣政策研議，此時他雖已不具公職身分，卻與其過去公職有關。葛超智託管論與 1948 下半年至 1949 上半年間美國臺灣政策的關係，筆者已另文討論。⁴³ 但公文書館的資料，卻有耐人尋味的記載，是以補充說明如下。

1948 年 12 月，這時的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部門，已改由原駐中國大使館顧問白德華 (W. Walton Butterworth, 1903-1975) 主持，⁴⁴ 他找葛超智進行閉門秘密會談，同時在座有主管中國課 (China Desk) 的石博思 (Philip D. Sprouse, 1906-1977) 陪同；會談中要求他提供親美臺籍領導的名單，以供政策制定參考。不過，葛超智的回答卻是，這些臺籍領袖早已在二二八事件中肅清。⁴⁵ 由這事可知，1948 下半年至 1949 上半年間，美國研議臺灣政策之時，曾受到他託管論的影響。最後，在 1949 年 6 月 23 日國務院政策計畫處主任肯楠 (George F. Kennan, 1904-2005) 提出題為「臺灣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Pescadores) 的備忘錄中，主張聯合國或美國短暫託管臺灣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visional

⁴² 全名為《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第三八冊政治：臺灣二二八事件》。

⁴³ 蘇瑤崇，〈葛超智先生 (George H. Kerr) 託管臺灣論之思想與影響〉，頁 533-573。

⁴⁴ 參見筆者執筆〈巴特沃斯〉解說，收於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2008)，頁 49-50。在華美國外交官都有中文名字，本段中文名之使用乃根據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一書所記。

⁴⁵ GHK4C01017。

international or U.S. regime)，直至對日和約簽訂，再以公投方式由臺灣人自行決定未來。⁴⁶ 這無疑是葛超智託管論影響最大的時候，但這「託管政策」只是曇花一現，不久旋被放棄。

此外，同樣在 1948 年下半年，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下簡稱 CIA）幹員至其任教的華盛頓大學找他，也要求他提供親美臺籍領導的名單，以供政策制定參考，他也是回答說他們已死於二二八事件中。⁴⁷ 因為他不再相信政府而不願與 CIA 合作，導致他被 CIA 列入黑名單，種下日後被麥卡錫主義迫害的因子。

無論親葛超智的友人，或反對他的學者，往往都誤解他是美國情報人員。⁴⁸ 雖然動機不同，但這誤解卻有共同之處，即都認為他代表美國進行託管臺灣或分離臺灣的任務，這可說是一種託管論好惡心理的投射現象。然而，從上述他的經歷來看，除在 1948 下半年至 1949 上半年間，其託管論曾一度受到考慮與徵詢外，事實上大半時間都只是他個人的主張，既非美國政府的政策，也不受重視或採行。多數時間，他的言行在政府內部屬於特立獨行；他非完全信賴政府當局，與上級關係衝突者多。把他當成情報人員，宛如以好萊塢電影劇情套用歷史解釋，反而模糊了歷史真實的一面。

五、有關琉球與臺灣研究的學術生涯與晚年 (1947-1991)

1947 年 3 月 17 日離開臺灣後，葛超智再也沒有機會重新踏上臺灣一步。而他的關心，也轉變成以琉球王國的歷史與文化為主。雖然如此，一直到晚年他與

⁴⁶ 參見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ior Affairs, 檔號：894A.00/7-649, p. 1；亦收於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357.

⁴⁷ GHK2B02006、GHK4C01017。

⁴⁸ 在前述註 4 部分，論文提到葛超智 1940 年來臺任教前，往往都會認為其背後的身分是「美國情報人員」。但殊不知 1940 年前，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瀰漫，正陷於經濟大恐慌的泥濘中，不僅情報局 CIA 不存在，甚至於連 CIA 的前身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簡稱 OSS）都尚未成立，何來先派遣情報員至臺灣探查，只能說這是無稽之談。

臺灣仍維持著不絕如縷的關係，對臺灣歷史的影響至今依舊不斷。所以如此，關鍵即在於他學術生涯中留下的著作與資料，以下簡單介紹其後半生涯，並說明其影響。

葛超智在 1947 年離開公職後，最初接受洛克斐勒三世 (J. D. Rockefeller III) 研究計畫的贊助，之後在華盛頓大學的遠東研究所 (the Far Easter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任教兩年 (1947-1949)，然後到史丹佛大學歷史系任教一年，再轉至胡佛研究所，任職上級副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1950-1956)。在這些大學中，主要教授日本史，其中兼開臺灣史與琉球史課程，1951 年起同時兼任柏克萊大學 (U. C. Berkeley) 講師，講授琉球史。⁴⁹ 在臺期間，他從遣返的日本人手中，購買了數量極為龐大的資料，其中有關遠東地區圖書由華盛頓大學購藏，而有關臺灣約兩千餘冊圖書則由柏克萊大學購藏。⁵⁰

1951 年，胡佛研究所所長哈洛·費雪 (Harold Fisher) 要求研究員提出建議的研究課題，葛超智列出臺灣與琉球相關的十八項論題，都與當時美國的政治密切相關。翌年 1 月，國立學術委員會太平洋學術局 (Pacific Science Board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哈洛·庫利治 (Harold Coolidge) 博士，邀請馬道克 (Mardock) 博士與葛超智一起參加琉球列島美國政府 (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以下簡稱 USCAR) 民政長官詹姆·路易士 (James M. Lewis) 准將主持的會議。在一週的會議後，詹姆路易士准將因聽到他們討論琉球歷史與文化，認為當琉球人反對日美和約的簽訂時，或許這些看法可以作為解決相關問題的靈感，因而對琉球歷史產生興趣，並詢問葛超智是否願意撰述一本概說性質的琉球歷史書。葛超智提出條件為：一，他可以在琉球群島間自由旅行不受限制；二，協助他可以自由利用日本圖書館與私人文庫；三，他不隸屬於民政府教育當局管轄。之後，他的調查報告在 1958 年出版，書名為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沖繩：島上民眾的歷史)，相關書目調查的結果，由琉球大學出版，名為《琉球文獻目錄》。⁵¹

⁴⁹ GHK2A06009、GHK2D05007、GHK4C01023、GHK4C01029。

⁵⁰ GHK2A06009。

⁵¹ 參見琉球大學藏，「1984 年 2 月 20 日葛超智致琉球大學圖書館事務長平良惠」、「1985 年 3 月 10 日致館長瀨名波之信」，以及 GHK2A06002、GHK4C01023、GHK4C01026 資料。

雖然，沖繩在二次大戰中遭受美國攻擊，造成 20 萬多人戰死，而戰後又被美國占領設立軍事基地，帶給琉球人民生活莫大的壓力。⁵² 然而，在葛超智調查期間，不僅未絲毫感受到琉球人民的憎惡，反而受到相當熱切的招待與協助，得到非常多的友誼，這使得他意欲對琉球人民有所回報。正因如此，促成了日後他發起捐贈琉球圖書活動，並將他所藏資料捐贈沖繩縣典藏。他先在 1954 年，捐贈 52 冊有關日本美術的絕版書，以及珍貴的日本名畫家狩野探幽與谷文等 4 幅名畫給琉球博物館收藏，之後又陸續將他收藏的圖書或資料捐贈給琉球大學。⁵³

這段研究生涯，可說是有正式舞臺，展現其學術才能最得意的時候。但好景不常，1950 年代初，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開始煽起全美國性的「反共十字軍運動」，即所謂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諸多名人遭到調查迫害。當時蔣是美國支持的盟友，反蔣被麥卡錫主義者視為親共，因葛超智經常投書批判蔣介石，致使他難逃迫害的劫運。⁵⁴

他指出，早在 1948-1949 年於華盛頓大學任教時，因常在課堂上批蔣，而被列為叛徒（traitor）及親共的「可疑名單」。⁵⁵ 1955 年下半年起，舊金山的地方調查站開始對他進行忠誠度調查，最初問的問題都是為什麼批判蔣介石，為什麼不提供政府臺籍菁英名單等過去的事；對此，他的回答均通過忠誠檢查，無從懷疑。⁵⁶ 然而，這仍無法避免麥卡錫主義者進一步的迫害，於是捏造他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以及私人問題等不實指控。⁵⁷ 而史丹佛大學因獲得政府重要研究計畫經費挹注，麥卡錫主義者遂對史丹佛大學施壓。在這些強大的壓力下，迫使他不得不在 1956 年 4 月 4 日向史丹佛大學辭職。⁵⁸

去職之後，他成為獨立研究者，專心投入前述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的研究著述，並於 1958 年由東京的 Charles Tuttle 出版社出版。1987 年，

⁵² 參見沖繩県平和祈念資料館編，《沖繩県平和祈念資料館總和案内》（沖繩：該館，2007），頁 90-149。戰死者中，也包含許多臺灣人。

⁵³ 參見前述「葛超智致琉球大學圖書館事務長平良惠」、「致館長瀨名波之信」，以及 GHK5D01034。

⁵⁴ GHK5D01033。

⁵⁵ GHK2A06009。

⁵⁶ GHK5D01035。

⁵⁷ GHK5D01033、GHK5D01035。

⁵⁸ GHK5D01030-01032。

該書第 12 版曾創下 13,000 本的銷售紀錄。⁵⁹ 1959 年，獲國家科學會太平洋學術局 (The Pacific Science Boar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獎助，進行日本學術研究調查。1960 年至 1964 年，獲洛克斐勒基金贊助，出任火魯奴奴大學藝術學院 (Staff member,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遠東文化史顧問，主要工作是調查戰火下倖存的琉球文化資產；⁶⁰ 然而，1965 年卻因與當時院長 (Director) 艾力思 (Ellis) 意見不合，憤而辭職。⁶¹ 此後他不再隸屬任何單位，成為獨立研究者，以著書、撰稿、甚至於靠變賣資料與收藏品等維生，一直到老死為止。

由上述簡單的民間職務經歷，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於琉球地方的學術調查與研究。儘管他的經歷相當波折，也沒有顯著職位，但他的影響或貢獻卻絲毫不遜於那些有顯著職位或頭銜的學界人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不容忽視之處，關鍵處即在他的著作與留下來的資料。

首先，就琉球的歷史與文化研究而論。琉球最早的相關研究，可上推至伊波普猷 (Ihafuyuu, 1876-1947) 建立的「沖繩學」，這是以琉球地方為對象開創的學術研究。然而，伊波的研究幾乎多在東京進行，他的著作往往著重在探討日本與琉球文化同一性，被視為並未脫離戰前的皇國觀點。葛超智最早出版的學術著作是《琉球の歴史》，⁶² 由於這是以琉球主體性為出發點的著作，是以美國琉球民政府有意推動沖繩地方的「離日政策」時，認為可作為很好的宣傳品；於是在 1956 年將他的研究報告譯成日文出版，並免費在大學等機構發送。本書出版後不久，即被指出一些問題。⁶³ 這或許是刺激他在 1956 年離開史丹佛大學後，屏除雜務，

⁵⁹ 參見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頁 119。在 GHK2A06002 中提到，Tuttle 社告訴他說將再版 1,000 本，由此可知，初版應該是只印 1,000 本吧。

⁶⁰ 參見 GHK2D05007、GHK2D05009、GHK4C01006、GHK4C01024-01025 等。

⁶¹ 參見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註 5，頁 120。

⁶² George H. Kerr 著、佐藤亮一等譯，《琉球の歴史》(沖繩：琉球列島米國民政府，1956)。本書前身原為 1953 年葛超智提交太平洋學術局的研究報告，標題為〈Okinawa: kingdom and Province before 1945〉(沖繩：1945 年之前琉球王國與廢藩置縣的歷史)，但這份研究報告僅做內部使用，並未對外公開 (GHK4C01006)。

⁶³ 例如，對八重山、宮古群島等地的重要性，給予過小的評價 (參見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頁 120)。2010 年 9 月 7 日，沖繩縣前知事大田昌秀先生接受筆者訪談時提到，葛超智常對人說日文版出版時並未經過他的同意，他不承認那是他的書。不過日文版書中有葛超智的序與謝辭，而且在他的履歷與自傳中都提到日文版的存在，是以說未經他同意或他不承認，應非事實。

專心撰述 *Okinawa :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的緣故吧。而這不只是首次由外國人研究琉球歷史與文化的著作，也是第一本以琉球主體性為研究觀點的著述。

其次，他在琉球進行田野調查期間，共拍攝約 2,500 張照片、2,000 張幻燈片，以及自各村落收集到約 25,000 張手稿。這些資料主要收藏於首里博物館，複製品則收藏於柏克萊與華盛頓大學、夏威夷的東西中心圖書館（The East-West Center Library）、火魯奴奴大學藝術學院等。⁶⁴ 對於日本國內外對琉球歷史與文化的研究而言，可說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如 Jenkins 所指出，琉球地方著名的指導人物，如比嘉幹郎、川平朝清、久手監憲次、宮城悅二郎，以及前知事大田昌秀等，自學生時代以來，即與葛超智有密切的往來，並接受其指導與影響。他不只對 USCAR 在特別問題的政策制定上有一定的影響，對於 1950 年代沖繩地方開始發展的二律背反現象（與日本文化同化運動，以及沖繩縣民的自我文化認同現象），也帶來一定的影響。⁶⁵

筆者曾請教沖繩縣前知事大田昌秀先生有關葛超智對琉球人影響的問題。他認為，在琉球主體性的啟發以及學術刺激方面，葛超智曾有過重要影響，這是毫無疑問。他提到葛超智對琉球的年輕學者相當照顧，他也曾受其關照。每當他們一起討論琉球史時，葛超智總會提出一些令他驚訝的資料，進而刺激他在學術研究上更加奮發。針對筆者「對琉球人而言，葛超智是否有研究價值」的問題，他回答當然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但遺憾的是，老一輩琉球學者凋零後，目前大學中已無人能影響後進進行葛超智研究。1985 年 7 月 1 日，葛超智獲《沖繩タイムス（沖繩時報）》頒贈「沖繩タイムス賞」，表彰其對沖繩歷史文化研究的貢獻，⁶⁶ 這可說是對他一生最佳的註解。

其次，關於對臺灣影響的部分，最重要的莫過於 *Formosa Betrayed* 一書的影響。關於此書的出版，海外臺灣人之間流傳一則說法，大要如下。此書原是與前 UNRRA 官員彭德華（Edward Paine, 1919-1998）共同整理二二八資料，並計劃在 1948 年時出版，葛超智甚至已獲某著名出版社預支經費。但後來他改變主意，

⁶⁴ GHK4C01023。

⁶⁵ 參見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頁 119-120、127。

⁶⁶ 1985 年 6 月 30 日，《沖繩タイムス》第 11 版。不過他因身體違和，當時並沒有親自領獎，而是在翌年才又重新回到沖繩。

將預支退回；據說當時是因他認識很多國務院外交部門高級官員，他認為透過私人關係可以替臺灣出力，比著書讓外交部難堪更有效，彭德華因此氣憤地與他分道揚鑣。至 1964 年，葛超智以大學教授必須有著作為由，徵求彭德華同意，要求採用他整理的資料。雖然彭德華覺得出書良機已經錯失，但仍然同意他的要求，此書才於 1966 年問世。但出版商後來將英文版權賣給國民黨，所以此書英文版只出一版，直至 1992 年臺灣才再版。⁶⁷

上述說法，除葛超智書中曾採用彭德華資料屬實外——因為在書的謝辭中，他表達了對其的感謝，其餘皆非事實。如 1956 年後，他早已不在大學任教，1964 年以後，他也完全不在任何學術單位工作，「大學教授須有著作」自無道理。如後述，英文版也非只有一版。若根據葛超智資料，葛超智與彭德華年齡相差八歲，在臺工作時的位階與經歷有很大不同，彭德華從事臺灣研究也是在 1947 之後。⁶⁸ 無論就學經歷而論，如果說 *Formosa Betrayed* 是他們兩人共同「整理」，則言過其實。書中的許多關鍵內容，早已出現在他提供給大使館或國務院的報告中。雖然本書第八章有關 UNRRA 與 CNRRA 的部分，以及其他部分資料的提供上，⁶⁹ 彭德華有重要的貢獻，但本書絕大部分與葛超智的經歷密切相關，他毫無疑問是第一作者。

事實上，該書的出版過程可謂歷經波折，並非如前述傳言簡單。在一份推測應是 1948 年下半年的葛超智履歷書中記載：「準備中：反抗的火種：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1945-1947 (In Preparation: Seeds of Rebellion: Formosa under Kuomintang Rule, 1945-1947)」，⁷⁰ 說明他「正準備」出版一本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可以推測這本書就是日後 *Formosa Betrayed* 的前身。而在 1965 年 7 月 5 日他致「琳達·葛利可 (Linda Glick of Houghton Mifflin)」的信中提到：「約在 1948 時，我提交

⁶⁷ 根據前臺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楊宗昌先生的記述，〈佩恩先生：一位目擊二二八事件的美國友人〉，刊登於臺獨聯盟的網頁，下載日期：1998 年 12 月 30 日，網址：<http://www.wufi.org.tw/taiwan/painec.htm>。

⁶⁸ 根據葛超智記述 (GHK2B01002)，彭德華生於 1919 年 12 月 14 日，就讀空軍士官學校，後畢業於邁阿密的陸軍航空隊預備軍官學校 (AAFOCS, Miami Beach)，1942 年 12 月 9 日官拜陸軍少尉，1943 年 1 月畢業於賓州陸軍航空情報學校 (AAFS)，服役後同年 8 月歷任戰鬥情報官，執行官等職。期間在中國服役兩年，印度三個月，1945 年 9 月調回美國，1946 年 3 月 28 日退役。而自 1946 年 2 月 13 日起至 1947 年 5 月 20 日止，出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臺灣辦事處的報告官與經濟分析員 (Reports Officer and Economic Analyst)。1947 年 6 月至 1948 年 12 月從事臺灣研究，以及為臺灣撰文與演講。

⁶⁹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葛超智資料中，有兩大盒卡片的筆記記錄，這應是兩人共同整理的資料吧。

⁷⁰ GHK4C01006。

有關臺灣的報告給太平洋關係研究中心，曾有出版社有意出版此報告。但經過很久的時間後卻一直沒下文，最後才知道原稿被送到國務院進行內容檢查後，卻遭到反對出版，理由是我主張在蔣介石敗避臺灣之前，應介入臺灣問題。一直到 1950 年我才拿回原稿，但為時已晚，因為麥卡錫主義已開始盛行，我更沒有機會出版了。(筆者譯)⁷¹ 引文中的稿件，應該即是前述「正準備出版」的書。由此可知，書當時沒有出版，是遭到政治打壓，並非葛超智不願出版，可知傳言並非事實。

之後，1958 年葛超智再補充前述原稿內容，而形成 *Formosa Betrayed* 原稿。他雖一再努力詢問各出版商的意願，最後都只得到很客氣與禮貌的婉拒。一直到 1964 年，在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的影響下，美國對臺政策開始走向「棄蔣」，朝承認中共中國的方向發展時，情況才得到改變。當費正清看到 *Formosa Betrayed* 原稿時，毫不猶豫向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推薦出版，這是何以該書一直延到 1966 年 1 月才出版的原因。⁷²

對於美國臺灣政策或臺灣問題的主張上，費正清與葛超智分別代表兩個極端或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位是在朝當紅、有甚大影響力、屬主流意見的學者，主張臺灣問題是中國內部問題，美國不必為此多費心力。一位是在野無職無位、屬非主流意見的平民，臺灣託管論的始倡者，主張美國應對臺灣人，甚至對臺灣獨立運動更積極的支持。兩人最大交集是在 1945 年於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的期間，曾經是好友。對書的出版處處碰壁的葛超智而言，獲得如費正清這般的紅人大力推薦，應該心存感謝才是。然而，後來他才知道，此書所以被推薦，並不是因為費正清關心或同情臺灣人民的未來，而是希望透過此書羞辱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並

⁷¹ GHK2A06002，原文是“in 1947-48 I prepared an account of the Formosan affair fo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which Little, Brown & Co. were proposing to bring out. A prolonged silence followed which I was not able to penetrate until I discovered that the MS had been sen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was there, of course, objected to, for I advocated intervention before Chiang K-S should move to Formosa and entrench himself. By 1950 it was too late; McCarthy was rising, and by the time I had retrieved my M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get a hearing. I do not want to take the risk of controversy before publication;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that soon enough thereafter.”另外，在 GHK2A06002 的資料中，也簡單提到在 1950 年代，蔣介石之友到處充斥叫囂，麥卡錫時代到來，不是可以出版該書的時候。

⁷² 本書原計畫在 1965 年出版，但卻延至 1966 年才出版。葛超智推論，這可能與當時聯合國討論北京入會案有關，為免北京取得代表權，是以有政治力介入，希望在聯合國大會結束後，才出版本書。(見葛超智「致辜寬敏書」、「致道格拉斯曼德 (Dr. Douglas Mendel Jr.) 書」，參見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 (下)》，頁 653-656。)

將臺灣問題極小化或無形化，以強化其中國政策主張的正當性。這使葛超智的瑜亮情結油然而生，每提及此事，總有無限遺憾與感慨。⁷³

但本書出版後得到很大的迴響，不只有許多書評討論它，而且第一版在一年內即銷售一空，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應有再版。根據葛超智的自述，該書曾售出達 6 萬本，但根據其留下的版稅紀錄來看，似乎沒有如此多，⁷⁴ 應是誇大之詞。但雖不及六萬本，但至少售出萬本以上。⁷⁵ 不知何故，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卻在未經葛超智同意，甚至於未知會的情況下，在 1976 年 2 月 25 日，將版權移轉給位於紐約、據說有國民黨資本背景的 Da Capo Press 出版社。⁷⁶

Da Capo Press 取得版權後，不只未對該書進行任何宣傳推廣的活動，還將新版書售價從原來 6.75 美元，一口氣提高 5 倍為 35 美元。這種作法顯然並非基於商業考量，也不是為讀者或作者著想，反而使一般學子難以入手，葛超智認為這是不欲該書廣為流通所致。⁷⁷ 正因如此，海外臺灣人盛傳該書版權已轉賣給蔣宋美齡集團。⁷⁸ 而且過幾年之後，葛超智才知道版權轉賣之事，令他感到非常生氣與震驚，在積極爭取下，才於 1982 年 7 月重新取回版權。

1966 年，Houghton Mifflin 出版的同時，也委託英國的 Eyre and Spottiswoode 出版，是以目前可以看到的英文版 *Formosa Betrayed*，包含英國版一共有三種版本。另外，中文翻譯版最初是 1973 年在東京出版，⁷⁹ 但在臺灣卻是禁書。一直要到 1991 年，才由前衛出版社出中文版。而日文的翻譯，雖也由蕭成美先生同時進行，卻直到 2006 年 6 月才由同時代社出版《裏切られた台湾》。⁸⁰

⁷³ GHK2A06002、GHK2A07002、GHK2D05007。在 GHK2B02001-02016、GHK2B03001-03016、GHK4A01074 等，都是有關費正清的評論、文章與相關資料。

⁷⁴ 參考 GHK2A07001-07003、GHK2A08001-08002 資料。

⁷⁵ 在 GHK2D05007 的資料中，有一件 1976 年 4 月 15 日的備忘錄提到，該書出來後受到廣泛的評論，雖有國民黨及中國共黨人士的反對干擾，但仍然賣出 8,000 本，目前絕版中 (now out of print)。由此可知，第一版應該有 8,000 本。

⁷⁶ GHK2A07002。

⁷⁷ 在葛超智資料中，常提到國民黨常中傷該書以妨礙流通。(GHK2D05009)

⁷⁸ GHK2A06008, letter: Ralph Lai to GK (1970 年 3 月 30 日)。

⁷⁹ GHK4L01029。中文譯本是由陳榮成先生翻譯，據「Taiwan Today」網頁，中譯本是 1974 年時分別在紐約與東京出版，但在臺灣則是禁書。June Tsai, "Formosa Betrayed' boosts book sales, interest in past," 下載日期：2011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taiwantoday.tw/ct.asp?xItem=24763&CtNode=430>。

⁸⁰ 在 GHK2A06005 中，「1974 年 9 月 24 日 Kerr 致黃昭堂 (Ng Chau-tong) 信」中提到「up until that date, the Japanese edition hadn't yet been published」。本資料感謝 Jonathan Benda 教授提供。

而就在 1982 年他取回英文版權後，海外臺灣人團體積極的向他購買英文版出版權。不過在洽談過程，如後述卻是一波三折，幾乎破局，最後葛超智是否出售了英文版權給臺灣人團體，筆者在公文書館資料中沒有發現直接證據。只是目前在網路上可以很輕易的免費下載該書英文版全文，由此推論臺灣人團體與葛超智間應該存有一些默契才是。

在 *Formosa Betrayed* 之後，他又於 1974 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臺灣：認可的革命與自治運動）。從書名可知，這是在探討日本殖民時代臺灣的歷史，重點在論述歷經 50 年殖民近代化與工業化的改變，臺灣與臺灣人已與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不同；1945 年後，實不適合突然將臺灣回歸中國。本書因為有基金會貸款協助，才獲得出版，但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並不積極為此書宣傳，是以該書銷售狀況並不理想。不過，本書肯定殖民地時代對臺灣現代化、工業化的貢獻，這是後殖民時代教育中不可說的事實，或許也是本書在海外臺灣人之間不流行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還有一本 *Frontier Island: Formosan History and the Separatist Tradition*（國境之島：臺灣歷史與分離主義者的傳統）手稿，這是一本從「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角度，探討 1895 年以前臺灣人脫離中國束縛的歷史傳統。雖然在葛超智資料中，可以看到他積極的尋找出版社，⁸¹ 但筆者最後還是未找到該書正式的出版紀錄，本書稿本目前收藏在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中。⁸²

他晚年最後出版的著書，為 1986 年的 *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面對危機的臺灣》）。⁸³ 原本，該書是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以下簡稱 FAPA）想購買 *Formosa Betrayed* 英文版權重新出版，但條件是希望葛超智能再補充該書內容，並撰述 1950 年以後至 1970 年之間臺灣歷史發展，附加在新版書中出版。但他認為這將使新書過於龐大，造成讀者負擔，無法購買；同時他年紀已大，無法進行重新著述的工作，是以希望只集中撰述 1950 年後的歷史發展。

⁸¹ GHK2E06008 資料，是史丹佛大學出版社評審退件的理由書，其中提到該書與費正清教授見解相左，這是不同意出版的理由之一。

⁸² 參見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館藏，編號 A-GK-004-0003-026、A-GK-004-0003-0027、A-GK-004-0003-028。

⁸³ George H. Kerr 著、吳昱輝譯，《面對危機的臺灣》（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該事歷經一年多的進行，當葛超智即將完成 1950 年以後補述的部分時，不料 FAPA 方面仍認為版權的購買，應包含 *Formosa Betrayed* 重述的部分。這讓葛超智無法接受而幾近破局。最後 FAPA 讓步，同意將 1950 年以後的部分獨立出版，這即 *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 一書的由來。⁸⁴ 其內容重點主要是探討冷戰時代臺灣的現狀和面臨的一波又一波國際危機，主張臺灣應脫離中國及羈絆諸國的控制，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本書隨即成為當時海外黑名單臺裔美國人及其第二代認識臺灣的基本教材，1987 年美國 WMDIT「穩得」(陳翠玉領導創立)⁸⁵ 再版，並號召美國的「臺灣運動」志工親送美國參眾議員辦公室(共 533 份)，寄贈各國駐聯合國代表(共 165 份)，寄美國暨世界各大學亞洲研究所圖書館收藏(共 18 國 165 研究所)。1988 年最初的中譯版，由高雄「新臺政論」出版，但旋即被查禁，⁸⁶ 直到 2007 年前衛出版社才又重譯出版。

前述 *Frontier Island: Formosan History and the Separatist Tradition*、*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Formosa Betrayed* 與 *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構成了他對臺灣四百年近現代史發展的論述；⁸⁷ 論述的中心，在探討四百年來臺灣獨立歷史的發展過程。然而，他在一份自傳備忘錄中卻寫道：「雖然我有很多在日本、英國與美國從事臺灣獨立運動的朋友，但我很謹慎的與獨立運動保持距離，因為我認為或許「它」可能是一種沒有希望的運動 (I believe may be a hopeless cause)」，⁸⁸ 他卻又不認為臺灣獨立有成功的可能。這種思想上的矛盾，正反映出臺灣歷史獨立的「事實」，與反獨立的「國際現實」，兩者間互相背反的發展現象。

他在晚年，也曾企圖研究夏威夷王國史，⁸⁹ 是以可以看到他收集了相關資料，保存在公文書館中。而對卡拉卡瓦 (Kalakaua, 1836-1891) 國王的研究，也

⁸⁴ 見 GHK2F01001-01007 之資料。由於 FAPA 相關信件不公開，目前僅能從葛超智的信件副本中得知。

⁸⁵ 全名為「婦女臺灣民主運動 (Women'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 簡稱 WMDIT)」。

⁸⁶ George H. Kerr 著、吳昱輝譯，《面對危機的臺灣》，封面。

⁸⁷ 除上述提到的著作外，他也有一些零星文章，收於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文集》。

⁸⁸ GHK4L01029。

⁸⁹ 夏威夷諸島在 1810 年統一成獨立的王國，但在 1898 年被美國強行併入為其領土。

接近完稿階段，⁹⁰ 終因年邁而未及出版。對他而言，研究臺灣、琉球與夏威夷的歷史，三者有其共同之處，亦即它們應該，或者說本來是獨立的國家，但在近代帝國主義的發展下，卻無法逃避遭大國殖民的宿命。⁹¹

葛超智終身未婚，七十歲後患心臟病，1987年在心臟加裝機器以助心跳，後有輕微中風，移住夏威夷的老人療養院。1991年夏天在病床上，接受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訪問，這是他生前與臺灣最後的接觸。1992年8月病逝於檀香山。⁹² 遺願將大體捐給醫院，遺產捐慈善團體，並將日後所有版稅捐給琉球大學作為獎學金，資料則捐給沖繩縣公文書館收藏。⁹³ 1999年2月28日，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首度公開展示他有關臺灣的資料，國人得以重新認識他。

六、結論

日本沖繩縣所藏的葛超智資料，雖然大部分與琉球的歷史、文化有關，但仍有相當份量與臺灣有關。這些資料包括戰前與戰後的事情，以及1950年以後冷戰時代與臺灣相關的事項。其重點包括國際媒體或國際社會如何看待臺灣問題，也包括葛超智與海外臺灣獨立運動者往來的書信，這些資料都是臺灣所無，可以補充臺灣戰後歷史，以及冷戰時代海外視點的臺灣史研究。如果能與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胡佛研究所藏葛超智資料對照研究，相信對於臺灣現代史發展的認識，有相當之助益。

若單就葛超智個人與臺灣關係及其影響而論，可分成戰後的公職與託管論、*Formosa Betrayed* 及其史料等三部分。首先就戰後的歷史洪流而言，其方向是將臺灣硬推向中國。洪流底下，真正具有關鍵影響力者，仍是那些掌握實際大權的在位者。葛超智不過是美國駐臺副領事，他在戰後的涉臺事蹟及託管論，實際上是出自個人憤激的正義感，而非美國主流政策或主張，這點使他在美國的官僚系

⁹⁰ 參見 A. P. Jenkins 著、嶺井優香譯，〈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問題〉，頁 120。

⁹¹ 參見 GHK4A01070 葛超智撰述之〈沖繩旅行回想記〉。

⁹² 蕭成美、川平朝清，〈カール先生について〉，頁 19。

⁹³ 參見 GHK5B01002、GHK5B01004-01005、GHK5B01009 等遺囑資料。

統中更顯格格不入與特立獨行。他企圖扮演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結果只不過宛如投在歷史洪流中的一塊石頭，雖激起一時令人驚訝的水花，卻未帶來關鍵性的改變。所以，無論是贊成或反對葛超智者，不應過分誇大他對當時代的影響。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影響，反而是他的著作 *Formosa Betrayed*，以及其保存有關臺灣戰後史的史料。該書是第一本詳細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書籍，不只是以學者角度撰述，更是當事者戲劇性人生的紀錄。是以，在描述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諸多暴行時，往往具有第一手史料的價值，帶給讀者二二八事件鮮明事實的震撼。正因如此，本書對一般讀者的影響，遠遠超越其他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論作。親國民黨或統派立場者，因其揭露歷史難堪的瘡疤與其親臺灣獨立的立場，而恨他至極，極力想否定抹煞他。但另一方面，許多臺灣的年輕一輩，正是受到其書的啟發，才認識到國民黨政府不仁不義的暴行而深感扼腕與痛恨，並轉而思考臺灣的前途與發展，並支持臺灣獨立。然而，只要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正義與真相問題未解決，本書的影響將永遠持續下去。

最後，是他過去所藏有關臺灣的資料，這些包括書籍與紙本的文件史料等，數量相當龐大。以書籍而言，主要在柏克萊大學與史丹佛大學等大學中。這些書籍，不只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的學術文化狀況，究竟還有哪些善本為臺灣所無，對研究可以有何重要貢獻，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就紙本資料方面，主要與臺灣戰後史、現代史有關。這些資料記錄了國民黨政府所抹殺或掩蓋的一面。透過這些資料的研究，再對照官方或中文史料記載的不同，將可發現新的問題或揭發出一些已被埋沒的歷史事實。總之，沖繩縣公文書館藏的相關資料，對於後人認識臺灣戰後歷史的發展，將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這點更是吾人應深入發掘之處。

引用書目

- 沖繩縣公文書館館藏，「ジョージ・H・カー（George H. Kerr）文書」。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ial Affairs、China: Interial Affairs。
- Jenkins, A. P.（著）、嶺井優香（譯）
2001 〈ジョージ・H・カー：目録作成に関するに問題〉，《沖繩県公文書館研究紀要》3: 107-130。
- Kerr, George H.（著）、佐藤亮一等（譯）
1956 《琉球の歴史》。沖繩：琉球列島米國民政府。
- Kerr, George H.（著）、吳昱輝（譯）
2007 《面對危機的臺灣》。臺北：前衛出版社。
- 尹章義
2006 〈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歷史月刊》219: 47-54。
- 沖繩県公文書館（編）
2011 《ジョージ・H・カー文書目録》。沖繩：沖繩県公文書館。
- 沖繩県平和祈念資料館（編）
2007 《沖繩県平和祈念資料館總和案内》。沖繩：沖繩県平和祈念資料館。
- 林宗光
1994 〈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收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臺灣人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頁69-110。臺北：前衛出版社。
- 陳翠蓮
1995 《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
1991 《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臺北：獨家出版社。
- 黃富三
2002 〈葛超智與臺灣主體意識的發展〉，收於胡健國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1107-1136。臺北：國史館。
- 黃彰健
2007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畢凌晨
2007 〈葛超智對二二八事件與美國政府觀點之差異：第一手觀察與外交決策間的矛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成美、川平朝清
2006 〈カール先生について〉，收於ジョージ・H・カー著、蕭成美譯，《裏切られた台湾》，頁1-15。東京：同時代社。

鮑紹霖

- 1993 《「臺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臺北：海峽評論出版社。

蘇新

- 1993 《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 《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瑤崇

- 2002 〈葛超智先生文集與書信集評論〉，《臺灣人文生態研究》4(2): 57-70。
2003 〈葛超智先生 (George H. Kerr) 託管臺灣論之思想與影響〉，收於國立嘉義大學編，《歷史、地理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21-560。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2004 〈葛超智 (George H. Kerr)、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之關係〉，《國史館學術集刊》4: 135-188。
2006 〈脫殖民地乎：UNRRA 資料所見的臺灣戰後善後重建問題〉，收於蘇瑤崇主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頁 9-33。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6 〈葛超智資料整理過程說明〉，收於蘇瑤崇主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頁 612-615。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8 〈巴特沃斯〉，收於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頁 49-50。臺北：國史館。

蘇瑤崇 (主編)

- 2000 《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上、下冊。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2 《葛超智先生文集》。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2004 《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5 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6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Jenkins, A. P.

- 2001 "G. H. Kerr's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and Beyond." *The Ryukyuanist* 52: 3-1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d.)

-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Related to Taiwan and Life of G. H. Kerr in Papers of Okinawa Prefectural Archives

Yao-tsung Su

ABSTRACT

George H. Kerr (1911-1992), a former U.S. Vice-Consul in Taiwan and a witness to the 228 Incident in 1947, advocated U.S. or U.N. trusteeship for Taiwan and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Kerr left behind many significant books and records about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Okinawa that are collected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U.S.), the Taipei 228 Memorial Museum (Taiwan),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and the Okinawa Prefectural Archives (Japan). These materials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t-war history of Taiw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little-known materials related to Taiwan that are contained in the G. H. Kerr papers of the Okinawa Prefectural Archives (OPA).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Kerr'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what the records in the OPA can tell us about Kerr's influence on Taiwan's history and about how Kerr's advocacy for Taiwan affected his own life and career.

Keywords: George H. Kerr, John King Fairbank, *Formosa Betrayed*, 228 Incident, Trusteeship for Taiwan, UNRRA, FAPA, Okinawan History, McCarthyism, USCAR,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